

曾国藩绝学

——
官场秘术集成

时代文艺出版社

曾国藩绝学

——官场秘术集成

第九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德 养

第三章 学 道	(4063)
一、学以问道 文以载德	(4063)
二、格物致知 学道成德	(4079)
三、学而优则仕 道而通则德	(4127)
四、择书而读 虚心向学	(4157)
五、读书能益智 求学可增善	(4208)
六、文道合一 才德并进	(4239)
第四章 齐 家	(4266)
一、家和万事兴 家齐国可治	(4266)
二、先扫己屋 后扫天下	(4296)
杨震的清白遗产	(4310)
崔瑗的《座右铭》	(4311)



曾国藩绝学

目 录

范式、张劭生死之交	(4313)
马后拒封外戚	(4314)
曹操遗令	(4316)
曹操谨记桥公约	(4317)
自贬三级的名相	(4319)
死而后已	(4321)
家风绵长	(4323)
舍家卫国的朱伺	(4325)
舍家为国的卞壶	(4326)
为叔理财	(4328)
朱序的母教	(4329)
和亲睦邻的李士谦	(4331)
蓝田性急	(4332)
吴隐之与“贪泉”	(4334)
兄弟友善	(4336)
唐太宗巧化矛盾	(4338)
一家和睦的穆宁	(4339)
柳公治家	(4340)
“三相张家”	(4342)
皇室节俭立家法	(4343)
全德元老之碑	(4346)
包拯家规严	(4348)
三、盛时常作衰时想 上场当念下场时	(4350)
“花未全开月未圆”	(4351)
四、家盛由俭 家败由奢	(4362)
司马光教子	(4379)
范仲淹设义庄	(4381)

目 录



目 录

林逋“梅妻鹤子”	(4384)
刘恕的《自讼》文	(4386)
怜孤恤贫的陈希亮	(4388)
于令仪教贼	(4389)
邵雍的“安乐窝”	(4391)
晏殊的与兄书	(4392)
丹心照汗青	(4394)
马皇后孝慈治宫	(4396)
枫山先生言传身教	(4399)
民女上疏	(4400)
阿寄报主家	(4403)
谭晓治农家	(4405)
历配三王的才女	(4407)
秦良玉勤王著功勋	(4408)
张岱戒己自铭	(4410)
彭玉麟以俭劝弟	(4412)
彭玉麟重友邻	(4414)
朱轼节俭治家	(4416)
五、不求富贵门第 愿为耕读人家	(4418)
非淡泊无明志 不贪荣华富贵	(4449)
六、功名利禄不可恃 勤俭和睦犹可追	(4452)
七、有福不可尽享 有势不可尽使	(4493)
八、奉亲宜敬 治家贵严	(4508)
九、富家子女戒娇 贵家子女戒傲	(4529)
十、父子以礼相待 兄弟以德相爱	(4549)
兄弟友爱，读书专一，择友谨慎	(4587)
十一、家人莫入衙门 私宅不问公事	(4622)



曾国藩绝学

目 录

十二、礼尚往来 重情轻物	(4623)
十三、远亲当敬 近邻勿轻	(4624)
郑板桥不忘众乡亲	(4630)



第三章 学 道

一、学以问道 文以载德

【原文】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旨，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迹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



曾国藩绝学

第三章 学道

学以问道 文以载德

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嫻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断断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



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 upper 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减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何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何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绝学

【译文】

去年承蒙您赐言，您所讲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理由，非常正确而且非常详细，不过对于我却多有宽容的词句，这是试图鼓励我不断进取，还让我陈述治学的要点，用心良苦啊！我早年没有树立治学的大志，从庚子年开始，才稍稍从事学问研究，涉猎了明、清两朝各位大学者的著作，但不能辨别他们的得失。听说这里有擅长古文、诗歌写作的，前去讨教受益，原来是桐城派姚鼐所传的古文宗旨，其观点确实有可取之处。因此，我就找来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的文章，认真揣摩阅读，其他诸如六朝擅长作诗的人，以及李白、苏轼、黄庭贤这些人，对他们的作品我也大量浏览翻阅，并分析推究他们的创作指归，这样做了之后才明白，古代那些通晓大道的人，没有一个不精通文字表达。善于作文却不能掌握大道，可能有这样的人，但哪里有通晓大道却不精通文字表达的人呢？古代圣人观察天地的形象、鸟兽的行迹而制作出表达符号，由此才有了字素，字素与字素相结合就成为文字，文字与文字相联接就成为语句，语句与语句相联接就成为篇章，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用文字则能曲折周到地传达出来。所以说文字是用来代替语言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流传到千百代的工具。伏羲已经深深地发现了治理天、地、人的根本道理，因而画出卦象来显示它，周文王、周公又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因此确立文字来阐明它，孔子进一步写作《十翼》，修定各个经书来阐释、显示，从而使原本散见于万事万物之中的大道，也差不多都集中显现于文字中了。人们之所以尊崇圣人，是因为认识到他们确立了行为规范，在与万事万物接触、实践的过程中就能够完满地合乎、遵循大道，他们留下的文字可以教导后世的人们。我辈读书人能够有所依恃地学习圣人贤人，也是借助文字来考察古代圣人的行事，从而推究他们的内



在思想之所在。如此而言的话，那么在这些语句与语句相联接、文字与文字相联结而成的文章里，古代圣人的精神思想言谈笑貌都完全寓于其中了。因此，使用文字时稍有丝毫的差异，就可能导致很大的谬误。文词气势或平缓或峻急，文章韵味或醇厚或淡泊，写文章的人稍有不慎，表达效果就立刻发生变化；读文章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迷茫不得要领。因此，我个人认为，目前要阐明古代圣王的大道，必须把精深地钻研文字作为关键。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清明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了市井乡间整个社会。因此，那时那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南方江汉游玩的女子，都天性忠厚贞静，通晓吟咏性情，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美文才出众，又自不待言。到了春秋时期，先王的恩泽开始衰竭，大道本身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化了。所以当孔子目睹了被捕获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完了啊！”被匡人包围、威胁，孔子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其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演变。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人擅长撰文著书，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掌握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品位：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较多的人，他的文章就较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自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后，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所说的掌握大道多少的标准是什么呢？它们是：精深和广博。过去，孔子阐明《周易》来显明天道，写《春秋》来确定社



曾国藩绝学

第三章 学道

学以问道 文以载德

会行为的准则，可以称得上精深啊！孔子教育学生分为四科，其中子路通晓军事，冉求善于理财富国，孔子还向李耳请求过礼仪的学问，向鲁国的伶工探讨过音乐的事情，后世出现的九个学派，都由此发源，可以称得上广博啊！就精深而言孔子能够研求万事万物微妙的征兆，就广博而论孔子能够穷究万事万物的存在状况而用之于一切实践。后来的人们在把握大道上之所以赶不上孔子，是因为他们在精深上不够精深，在广博上不够广博。能够达到精深而又广博，从而在作文方面又不丧失古代圣人的义旨的人，孟轲之后，只有宋代周敦颐先生的《通书》、张载先生的《正蒙》，醇厚正大，无与伦比。许慎、郑玄也能达到精深广博的境地，但他们在解释典籍上，有时不免失之琐碎；程颢、程颐、朱熹也同样臻至精深广博之境，但他们在发挥义理时，有时不免失之狭隘。其他学者如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应麟等人，这些人能做到广博却不能做到精深，他们的文章就因此流于鞠蔓浮浅；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衡、薛宣、胡居仁等人，这些人能做到精深却不能做到广博，他们的文章就因此存在着简易的不足。由此就出现了汉学、宋学的区分，彼此争长较短，由来已久。我不自量力，要想兼取二者的长处，力求对大道的把握既精深又广博，从而使写出的文章达到没有缺失的境界。我的这份心愿，简直是异想天开，好比是让蚊子去背负大山，盲人远行万里长路啊！也真是可笑至极。我的最高目标是向《通书》、《正蒙》看齐，退其次就苦读司马迁、韩愈的文章，认为这两位先贤也确实精深广博并颇知古人作文的方法。现下的论者不深究这两位先贤的思想，动不动就说司马迁的文章，充满愤懑不平的情绪，偏激而不温厚；韩愈的文章，简傲突兀，沾沾自喜。您或许是没有深入考察，也附合人们的这一流行说法，这样做如同是看到《盘》、《诰》二文显得艰深难读就由此认为整个《尚书》都没法



读，看到郑、卫之民歌涉于淫乱，从而就认为《诗经》全部要删除，这岂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没有深入细致地推敲吗？

孟子说：“君子得自于天的本性，即便是做了正确而重要的行为并不有所增益，即便是愁穷潦倒无所作为也并无减退。”我则认为君子的天性，即使饱读万卷诗书也无所增益，即使一字不识也无所减损。抛开书本学识来论究人的道德，那么就此而言，仁义忠信这些美德都具备于人的自身，尧舜孔孟这些圣贤并不比别人多些，识少位卑的普通人并不比别人少些，丝毫都不和文字学识相关联。结合书本学识来论究人的道德，那么就此而言，道德如同是人心所承载的义理，文字如同人身上运行的血气，血气当然不能就算是义理啊！但舍去血气的话，人的内在的本性义理又怎么能够有所附着呢？眼下社会上一方面是那些一味雕饰文采、缺乏大志远识的人，沉溺声律绘藻文学形式方面的细枝末节，另一方面，那些稍稍认识大道的人，又认为钻读圣人贤人的书籍，只应阐明其中的大道，不该考究他们的文字表达，这好比在观察人体时，主张只该考察人心之中所具有的内在义理，而不该考察人的耳目言行等外在血气的形迹，这不也是错误之至吗？既然明白舍去外在血气便无法考察内在人心的义理，那么就可以知道舍去文字便无法获知圣人的大道啊！

周敦颐主张文章是用来说明“道”并为“道”服务的，而拿“虚车”一词来讽刺指称那些浅陋之人所写的文章。“虚车”一类的文章确实无足可取，但连“车”都没有又怎么可以致远呢？孔子、孟子虽然已死，而他们的大道却至今犹存，其原因全凭有一致远的“车”啊！所以，我们这些读书人在今天如果确有见地，并打算把它传之久远，从这方面考虑的话，又怎么能够不及早具备坚固的“车”呢？因此，我一直存有这样一个粗浅的想法：我如果对大道有所认识的话，那么就不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它，还一



曾国藩绝学

第三章 学道

学以问道 文以载德

定要将它付之实践；不仅将它付之实践，还一定要求得以文字将它传播到后代。虽说做不到这一点，但我的志向却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于许多人的著作文章，都从他们的文字上比较他们把握大道的多少，细致分析他们的水平程度从而评价出优劣高低。对于汉学、宋学两家的分歧争端，对谁都不加以偏袒而附和起哄；对于各位儒者尊崇大道而贬抑文字的观点，尤其不敢附和响应而随便地步人后尘。我非常清楚我的这种想法狂妄错误之至，被有道之士所深深指斥，但把它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这种遮饰错误的做法就更加错误。我这里姑且借您的诱导而简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衷心地请求您原谅我的愚钝而批评我的错误，荣幸之至！

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者想跻身仕途，或者想发家致富，或者想陶冶性情，或者想消遣自娱。曾国藩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与一般的理学家一样，他主张读书的目的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曾氏亦如此。但另一方面曾氏又不囿于朱熹空谈的“性命”、“道德”，而继宋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地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氏认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



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卫身莫大如谋食。”（《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由此我们看到，读书于国、于己都是有益的，大可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与之量”，小可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两汉、两宋在读书目的上的显著区别，集中在读书是为了“经文本义”还是“微言大义”问题上，曾国藩对此采取调和的态度，将二者等量齐观。他宗主程朱，自谓学习力求“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六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认为“六经”是“理”的体现，读书必读“六经”，而读“六经”，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若苦苦思索，下功夫去穷究道理，这样才能达到读经的目的：“明天理”。与此同时，曾氏亦不薄考据训诂，认为先通训诂，习辞章，而后能读奇篇。“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家训·谕纪泽》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就是说读书必先疏通文字，疏通文字必须训诂，只有切实理解了字义、句义、章义，才能读懂文章，得其本义。这是符合“披文入情”的规律的。他又提出，对于古人的章句传疏不能一味盲从，而要有所甄别。“……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校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



曾国藩绝学

第三章 学道

学以问道 文以载德

其怀疑者，则以另删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家训·谕纪泽》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曾氏注意考据，敢于疑古，要求读注释也要经过思考，辨析，去伪存真，择善而从。其次，曾氏主张阅读要求深求博相济为用。两汉、两宋读经的分歧还表现在阅读方式上，是详加训诂，考究名物，还是只求大义，领略精微？宋学家们主承朱熹，强调熟读精思，主张“读书贵专不贵博”；汉学家们认为通一经（书）须通全经，且经史兼通，反对专守一经、寡闻鲜识的陋风。曾氏不囿于汉宋之辩，力主读书既要精又要博。一方面推崇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法，一方面认为“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家书·致九、四弟》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这是强调泛读能丰富自己，博览群书，多识广，而这又有益于文章之写作，“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日记·辛丑二月》）略读着眼于广度，而精读着眼于深度，目的在于透彻理解。关于这一点，曾氏打了个有趣的比方：“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争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二者不可偏废。”（《家训·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看书”，即泛读；“读书”，即精读。正所谓泛读是精读的基础，精读是泛读的深化。

《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称得上宏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顾、阎并称，顾炎武为自己做学问，而阎若璩则是为让人认识做学问。再有江、戴并称，江水为自己而学，戴震则免不了为被人认识而存在。又有段、王并称，王念孙为自己，段



玉裁则免不了为让人所见而存在。还有方、刘、姚并称，方苞、姚鼐为自己，而刘大槐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在那些仕途顺达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轼、秦蕙田，为自己而学的人占多数，但纪昀、阮元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他人而读书，心中总有一个别人，十分在意自己的所得所见以及这种所得所见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否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共鸣？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他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他的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他自己，他是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没有关系；为取娱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也是一件很寂寞、很清苦的事情，古语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一生致力于治学之道，无论是在京做闲官，还是在戎马倥偬的军旅，他每天都手不释卷，为文不辍。在教育子女问题